

[文章编号]1009-3729(2012)01-0079-05

韦政通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周良发

(安徽大学 哲学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韦政通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有独到见解,认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存在孤立研究、主观偏误、牵强附会、墨守成规、复古意识浓厚、缺乏理性精神、时代意识不足等缺陷,其更新之道在于研究者应加强逻辑思维训练和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在中国传统思想基本脉络的宏观省察上,韦政通做出了孔子中心而老庄异质的思想定位,并将秦汉以降的中国思想史分为制度化儒学时代、佛教时代、儒学复兴时代3个阶段。他还认为,明清之际民本思想的空前发展与重视客观认知的精神共同促进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换。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拓展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论域,其历史担当意识和关注现实的精神对当前的思想史研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民本思想;客观认知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韦政通(1929—),江苏镇江人,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现代伦理文化的创造、现代学术思想的建立、现代知识分子的品质塑造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韦政通不仅是一个坚守书斋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具有担当意识、立身现实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思想史研究上,韦政通不喜空谈性理而重客观精神,并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社会关怀融入其中。他治学甚广,政治、伦理、教育等无不纳入其视野,其主要论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思想批判》《传统与现代化》《伦理思想的突破》《知识分子的责任》《儒家与现代中国》等。韦政通蔚为壮观的学术成就与宏博气象以及他贡献于世的生命智慧与社会关怀,使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历史传统与文化哲学两个方面对韦政通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本文拟对韦政通学术研究中的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脉络省察及其现代转化三个

方面予以归纳、探析,以管窥他为中国思想史研究所做的学术贡献。

一、韦政通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析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考量上,韦政通首先深入剖析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主要缺陷,进而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更新之道。

1. 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缺陷

在对中国思想史的宏观省察中,韦政通发现,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方法上存在诸多弊病,如孤立研究、主观偏误、牵强附会、墨守成规、复古意识浓厚、缺乏理性精神、时代意识不足等。^{[1](P131)}

其一,孤立研究。在中国传统思想史研究上,无论是义理研究还是辞章考据,孤立研究乃是大多数学者常用的方法。在《答胡宽夫》一文中,朱熹曾云“格目之内,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朱子语类》卷九十六)这是对孤立研究法的充分

[收稿日期]2011-09-12

[基金项目]2010年安徽大学杰出青年科学研究培育项目

[作者简介]周良发(1979—),男,安徽省六安市人,安徽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

肯定。孤立研究法并非一无是处,它是深入研究的必备环节。但在韦政通看来,孤立研究法易“溺于琐碎,不能贯通大意”^{[1](P132)}。孤立研究法虽可以很精确地探得一字一句的内涵,对一章一篇的主旨却难以得到理性认知。故而,古人在对典籍之只言片语的解读上虽头头是道,但在对全书基本义理与思想主旨的理解上却甚茫然。

其二,主观偏误。韦政通认为,当人初起学问之路、初扬学术之帆时,兴趣是一股强劲的推动力,当兴趣落实到具体的研读对象上,自然会产生主观的爱好。倘若没有主观爱好,学术研究就很难展开,但主观爱好多半只能满足个人的感性需求,难以获得理性认知。一个人如果始终限于主观爱好,必将偏于情绪化的语言而难以做到客观的叙述,从而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偏误。事实上,先秦以来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常常陷于这种自囿境地,而他们所表现的正是“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的方法论偏蔽。

其三,牵强附会。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牵强附会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比附,即把西方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比附,或者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二是争胜心理,认为“你有,我也有”。比如民主自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具备的,但近代学者常以古代贵民爱民等民本思想为例说明中国并不缺少民主传统。在韦政通看来,正是这种牵强附会的治学理念使国人不敢面对现实,缺少“是什么就是什么”^{[1](P132)}的认知心态,从而造成学术研究的复杂面相:既曲解了传统思想又否定了西方文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中国现代化的理性认知。

其四,墨守成规。韦政通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思想的主要方式是注疏体,古代注家有“疏不犯注”的传统。所谓“疏不犯注”就是说做疏之人必须依据注文,只能引申注的涵义而不能批评它的是非得失。这种理论规约使人只有墨守成规。从实质上看,这种工作只有量的积累而少有质的突破。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的日趋完备,更助长了国人的趋旧意识和这种弊端的蔓延。久而久之,思想文化只知因袭而不知创造,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墨守成规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演变与更新的绊脚石。

其五,复古意识浓厚。复古意识乃是情感的产物,没有理性依据,源于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中国近代以来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均或多或少地存在复古意识,认为古代圣贤的学问与智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法则。在韦政通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一种思想或一种观念是否有价值,与它是不是属于古人无关,因为现实生活是一个动态过程,先哲的思想再有智慧也不能妥善处理一切新问题。复古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理解与接受。

其六,缺乏理性精神。韦政通认为,由于学术思想研究的独特性,凭借情感因素往往颠倒是非,只有理智的态度才能明辨得失。比如,自章太炎、梁启超提出“整理国故”以来,胡适、顾颉刚等人都积极参与此论域的探讨与研究,然而“国故”的优点和缺点何在,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之所以如此,一是情感因素的作用,一是理性精神的不足,即学界缺乏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与批评精神。

其七,时代意识不足。韦政通认为,学术思想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立足古代,以古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文化了解古代社会;一是立足当下,用现代学术标准来权衡古代思想文化。没有第一个层面,对古人可能缺乏理性认知;没有第二个层面,则难以重估古人的价值。由于时代意识淡薄,研究者往往偏重第一个层面而忽略第二个层面。因此,研究思想文化不能只做一个保存古玩古董商,而要如同工程师一样对传统思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以促进其向现代转化,否则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留给后人的不是适应现实需求的人生智慧,而是汗牛充栋的文化符号。有鉴于此,思想家应当增强时代意识,从现代的学术视角重新审视与深挖古代思想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意义。

2. 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之道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究上,韦政通不仅周详精湛地揭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弊病,还深入探讨了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之道。在韦政通看来,所谓更新之道乃是一套学习方法,即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必须经过一定的学习与训练,才能彻底扭转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偏失。

其一,加强逻辑思维的训练。韦政通认为,要

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有符合现代化需求的人才;要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化需求的人才,必须具备现代化思维;要有现代化思维,逻辑能力的专业训练是一个必要条件。在学术思想领域,逻辑分析能力尤为重要。学术思想研究的基本工作不是对各种资料的随意堆砌,而是对各种资料进行系统完备的梳理、分析与总结,以此推陈出新,创造新观念、开辟新境界。

加强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乃是学术思想研究得以深入展开的基本前提。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思维方式上多靠直觉体认,不懂逻辑推演。因此,仅阅读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很难得到系统的逻辑思维的训练,而当我们研读逻辑性较强的西方学术思想著作时,就会产生陌生甚至格格不入之感。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除了哲学系学生有机会接受系统的逻辑思维训练,其他专业的学生对逻辑学都很陌生。这种状况延缓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路向确实需要改变,明智的选择是加强逻辑思维训练,弘扬理性精神。

其二,加强社会科学的学习。19世纪以前,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还只是哲学的一部分,随着现代学科专业的建立与完善,这些学科纷纷脱离哲学大家庭而自立门户。尽管这些学科已经成为独立门类,但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仍然应该学习这些基本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知识,充分吸收这些学科的最新成果,以深化与规范思想史研究。掌握这些社会科学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极为重要。首先,人类学有利于中国哲学正本溯源。中国哲学的起源是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运用人类学理论探究中国哲学之起源是一条捷径,可为中国哲学找到真正的源头活水。其次,心理学有利于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性论。在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性论或者心性之学时,如果具备现代心理学知识,就很容易厘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与大纲目次。再次,社会学有利于确立儒释道各家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综上,在韦政通看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之道在于,既要加强逻辑思维的训练,又要学习基本的社会科学知识,因为逻辑思维训练有助于思维的现代化,而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助于

知识的现代化。思维的现代化加上知识的现代化,为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向度。

二、韦政通对中国传统思想之脉络的省察

1. 中国传统思想的兴盛

韦政通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勃兴于先秦时期,从春秋孔墨显学到战国诸子百家,可谓中国传统思想的黄金时代,不同流派之间、不同思想家之间绝少陈陈相因,均有独到见解。尤其是儒、道两大学派,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更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数千年文化的基本格局:儒家在社会政治方面影响较大,道家对文学艺术方面影响较深。此外,儒、道两家均是人本主义,对超自然现象兴趣淡薄。

其一,孔子地位的评定。韦政通指出,无论老子生于孔子之前或孔子之后,中国传统思想的起点是孔子而非老子。孔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开创者,是因为先秦诸子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实现了自身思想与传统之间的对接和传承,既继承了传统,又提出“仁学”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变革,为中国传统思想界开辟了一个道德的宇宙,形成了一个以道德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为解决春秋末期中国社会的两大困局——社会秩序的重建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孔子的“仁学”不但为政治确立了“为政以德”的施政准则,还以儒家人本主义理念凸显了个人的价值。

对于儒学到西汉才依靠政治力量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核心的观点,韦政通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在孔子前后的人物中,只有孔子才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因为他不仅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深刻的体认,而且其思想的前瞻性远非其他诸子所能企及。稍晚于他的诸子百家,无论赞同他还是反对他,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这足以证明孔子在先秦时期已处于思想界的中心地位,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

其二,老庄道家思想的异质性。在思想属性上,老、庄虽均为道家,他们的思想理路却大相径庭:在思维方式上,老子善于概念思辨,庄子诉诸主观体验;在表达方式上,老子的表达是分解性的,庄子的表述是描述性的;在理论进路上,老子重政治

哲学,庄子重人生哲学。

韦政通认为,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同,老子不托古、不言史而超越了传统,始终游离于历史之外,向往自然生活。老子思想的历史价值在于:通过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来使人们拥有一种新的向往,并以“道”、“自然”、“有”、“无”等概念建立了一个非道德意义的形上学。在治国方略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反对统治者对人民过分干预,希望有一个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对于庄子,韦政通认为,揭示人类现实生活的种种困顿是其思想的逻辑起点。毕其一生,庄子关注的是“人如何才能从感性文化与智性文化所造成的生命分裂与冲突中解脱出来”^{[1](P184)},过上一种真正自由而快乐的生活。他凭借洞察万物的直觉与想象,将宇宙万物视为混沌整体,人则“游”于其中,从而“游无穷之野”、“出入六极之外”。庄子对直觉与想象的创造性阐释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影响甚巨。

2. 中国传统思想的流变

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诸子百家并盛的时代彻底终结,思想文化发展步入了新时代。韦政通认为,秦汉以降2000年的中国思想史可分三个阶段:制度化儒学时代→佛教时代→儒学复兴时代。

其一,制度化儒学时代。在韦政通看来,秦汉之际是先秦诸子思想趋于融合与蜕变的时代,这种融合与蜕变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规约下进行的,而集思想之大成者乃是汉儒董仲舒。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型塑了制度化儒学。事实上,制度化儒学能够蓬勃发展、绵延不绝,主要依赖于西汉政府的两大举措:一是官办教育制度的确立,二是政府选拔人才制度的完善。儒家义理正是通过这两个渠道广泛深入地影响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二,佛教时代。制度化儒学的建立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在发展过程中时常受到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思想的冲击与挑战。自佛教于西汉传入中国,它一方面依附本土的迷信方术,另一方面又利用格义方式中国化,使其思想逐渐蔓延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佛教之所以能够顺利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思想对人的终极关怀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为佛教思想的传播留下

了空间。至唐代禅宗六祖慧能时期,佛学已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进入中国思想史。

其三,儒学复兴时代。韦政通认为,宋初诸儒大多有出入佛老的经验,这实质上已经孕育着儒学复兴的机运。儒学复兴的历史,若以唐代韩愈为起点,清代戴震为终点,时间跨度近千年,内容主要涉及三个领域,即经世致用、心性之学和经史之学。从“道问学”与“遵德性”的思想模式来看:北宋时期二者并重,南宋时期二者对立,明代以“遵德性”为重,清代以“道问学”为主。在韦政通看来,儒学之所以能够在佛、道两家的夹攻下再度复兴,一是源于宋初诸儒的大力推崇与重新诠释,二是佛教重心性、主超越的理念不宜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2]

三、韦政通对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的思辨

韦政通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析、对中国传统思想之脉络的省察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对中国传统思想向现代转化的哲学思辨才是他最重要的旨趣所在,也是其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中国传统思想现代转型的问题上,韦政通认为两股思潮有助推之功:一是明清之际民本思想的空前发展,二是重视客观的认知。^[3]

1. 民本思想的发展

明清之际皇权专制的日益加剧促成了民本思想的空前发展。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站在民本的立场上,对皇权专制进行了猛烈批判,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理论,认为臣子的职责在于“为天下非为君”,更不是“君之宠妾”,而是“君之师友”。更难能可贵的是,黄宗羲还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主张。在他看来,法的作用远大于人的作用,应当重视法治在社会中的作用。法治所依之法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天下之法”,而非“一家之法”,君臣上下都要严格遵守“天下之法”。韦政通认为,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与法治理念,已经孕育着民主思想的因子,向现代民主制度迈进了一大步。尤其是“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主张,已经从实质上触及了专制政体的根本问题,由此出发才能改变专制政体,走向民主共和。尽管黄宗羲对此未作进一步阐释,但他对此问题形上致思的内在理路是完全正确的。

韦政通指出,明末清初出现的民主思潮的大发

展,为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尽管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是外来思想,但与中国传统思想向现代迈进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提倡民主,是希望把中国固有的民本理念制度化,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以取代2000多年来的皇权专制;倡导科学,是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重视客观知识研究的国家,使国民养成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的治学精神。韦政通甚至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促使中国传统思想向现代转化的两个根本动力。

2. 重视客观的认知

关于中国古代为何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的原因,韦政通认为这与中国先贤客观研究精神的缺失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传统思想一向重视价值,尤其重视道德价值。但在韦政通看来,一套系统的价值观念,若没有客观研究作理论支撑,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僵硬的教条,而道德价值一旦沦为僵硬的教条就会束缚心智。从古至今,中国人人对人对事习惯于价值判断,缺乏理智分析,其优劣好坏之论也缺乏事实依据。尤其是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界倾向传统、倾向西化、倾向马列的人有很多,但客观研究者少而意气之争者多。意气之争培养不出对自身传统和世界文化的批判眼光,更遑论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了。

由于古人之研究缺乏客观精神,很多重要观念得不到进一步的发挥。比如“道并行而不悖”可以培养出尊重并容忍异见的精神,传统思想家却未作系统的阐发;又如“天下一家”的观念被国际社会演绎出“平等”、“互助”等诸多人文理念,在中国却始终停留在空洞的抽象层面。明清之际的多数思想家将明朝政权的灭亡归咎于阳明学派的“空谈心性”之学,对于这一见解,只有依靠客观研究才能给出结论及原因。由此可见,不作分析、批判而一味

地肯定民族文化,把传统文化理想化、神圣化,事实上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只会增长国人的痼疾而认不清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处境。必须客观地认知,培养怀疑精神并以此对传统思想进行客观研究,才能产生深刻的批判,进而由批判的过程知晓继承什么、吸收什么、创建什么。概言之,中国传统思想必须经过怀疑→研究→批判→抉择的大浪淘沙式的涤荡,才有向现代转化的可能。

四、结语

由于种种原因,韦政通并没有受到系统的大学教育,学术道路更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但他凭借非凡的天资与超强的毅力自学成才,终于成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知名学者,取得了足以垂范后学的卓越成就。作为一位对历史有担当、对现实有关怀的知识分子,韦政通在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论域的同时,又展现出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进一步充实了中国学术思想之内容。在此意义上说,无论是理论深度,还是治学广度,韦政通与任何同时代的学者相比都毫不逊色。^[4]

囿于历史条件与自身因素,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某些观点现在看来并不精当,但他那富有前瞻性的学术见解对当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确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韦政通. 传统与现代之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 韦政通.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57.
- [3] 韦政通. 人文主义的力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
- [4] 张汝伦. 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505.